

■关键词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老三届]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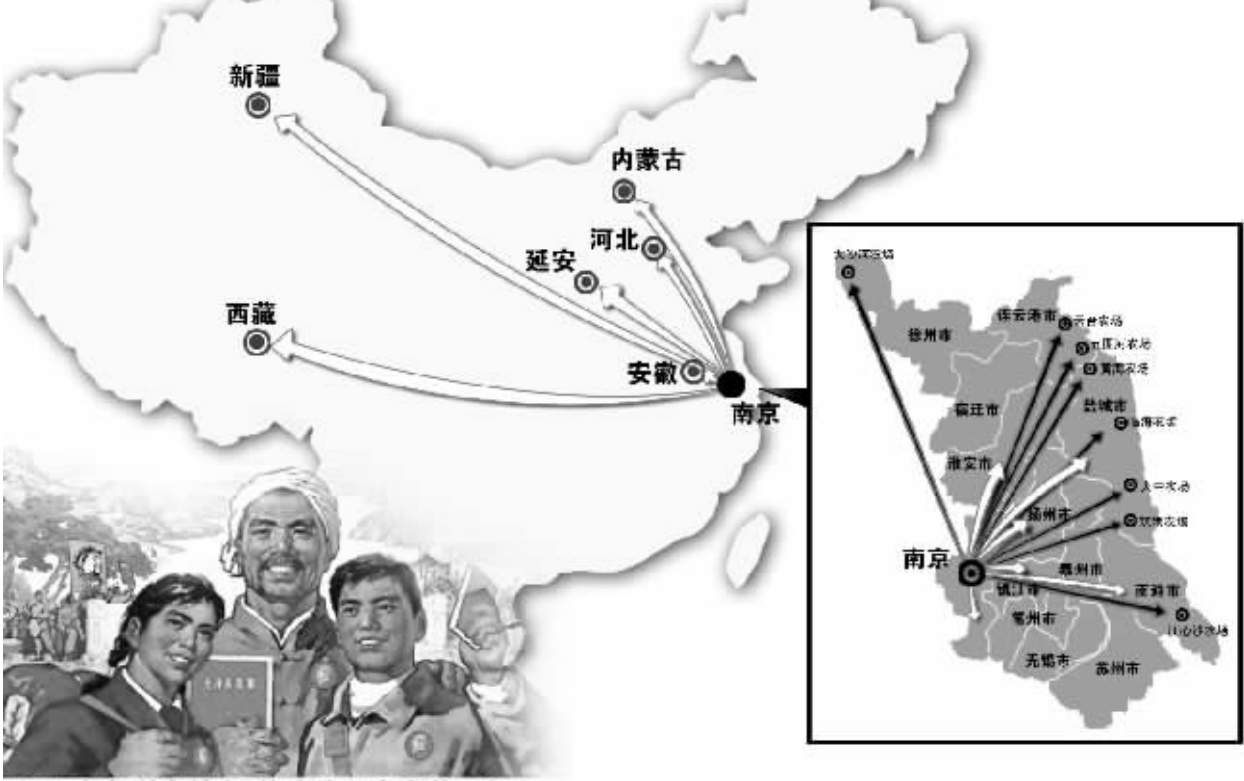
[生产建设兵团]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知青返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南京知青“上山下乡”路线图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注:本图根据现有资料整理,并非完全统计) 制图 俞晓翔

孙国光,男,23岁,团员,十三中毕业……这个“孙国光”,在1970年12月被人用钢笔小楷认真地登记在“伊盟插队知青花名册”上,保存在南京市档案馆的卷宗里;

2008年9月,60多岁的孙国光,真切切地又站在了令他魂牵梦萦的大草原上,回到了他40年前插队的鄂托克旗苏米图公社!

花名册依旧在档案馆里沉寂着,2000公里外两鬓已白的孙国光却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翻腾的思绪。40年前,他和无数“知识青年”们一起,从南京出发,奔向全国。滚烫的青春,何处存留?



当年在火车站,亲友送别南京知青的场景

南京出发,奔向全国

40年前,孙国光是1087人中的一员,这是南京赴内蒙古插队的知青人数。和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相比,这1087人算不上多。

记者尝试寻找当年像他一样的知识青年群体,开始才知道这是一项并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曾经“负责知青工作”的机构早就随着历史消失了,唯一权威而全面的资料来源或许只剩下了档案馆。

南京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很帮忙,搬来了高高一摞卷宗,牛皮纸的封皮下,每一页纸甚至都显得有些旧而脆。大量的手写资料、文件、铅字印刷的简报、红笔修改的记号,一段一段画线的文字……历史的碎片瞬间扑面而来,很快聚拢成一幅幅清晰的画面。

在这些交错的画面中,内蒙古只不过是场景中的一个。一份又一份的资料显示,南京知识青年们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

在本省,他们仅淮南专区就下到洪泽县、淮安县、淮阴县、沭阳县、宿迁县、泗阳县、泗洪县、灌南县、灌云县、涟水县,另外还包括省内其他专区的农村,如镇江、扬州、盐城、南通等,以及南京本市的郊区;去外省,有安徽、河北等;去支边,有新疆、内蒙古、西藏;去建设兵团,有五期河农场、琼港农场、大中农场、黄海农场、云台农场、江心沙农场、大沙河农场、临海农场等等。

直线上升的数字

翻开厚厚的卷宗,翻了一页,是手绘的统计表,再翻一页,

还是!遗憾的是,居然从头到尾没看到一份完整的,有关南京知青总人数的统计,因为当时的统计模式全部以区为单位,所以只能查到某一地、某一时间节点的数据。

栖霞区的一份情况汇报说,“自去冬今春(全区)就有3636名知识青年,到仪征的龙河、铜山、马集、谢集、刘集、大仪八个公社插队落户。”因为这份档案被归类在1967—1974年之间收录的卷宗里,未单独注明时间,所以无法判断统计数据所指的具体时间,但是从另一份表格中可以判断,应该是在1969年之前。

因为,这样的数据显然是在直线上升的,截至1969年4月21日的一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表,列出了当时全市九个区知青统计数据,当时栖霞区上山下乡人数已达7234人。全市九个区总计,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人数93270人,已上山下乡人数85193人,尚未上山下乡人数8077人。

建设兵团也是知青们的去向之一,1969年的一份任务分配表显示,全市九个区分配去五期河农场、琼港农场等地的知青人数共计2800人。

到了1970年,数字继续在变化,全市九个区“应上山下乡毕业生数”(66届、67届、68届)共计77921人……形形色色的统计表,尽管绝大多数是手绘的,但每一张都工整整齐,显然“人数”是最能体现知青们上山下乡是否热情积极的标尺,有按区统计的,有按家庭统计的,还有按街道统计的,中华门街道、二板桥街道、挹江门街道,与其说是比数字,不如说在拼热情。

喜悦吗?

那段如火如荼的日子,烙印般地刻在了每个人的脑海里。“知青安祥兰同志刚来陶利公社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茫茫的沙丘,住的是柳笆房子,走的是脚踪路,再加上语言不通,饮食不适应,便产生了畏难情绪,她暗暗后悔不该到边疆来……经过学习,她坚定了信心,决心在草原上踩一辈子粪土,干一辈子革命……知青中,有188人担任了会计、保管、教员、赤脚医生、拖拉机手等工作……”这样一些文字,400字一张的稿纸,足足写了有十几页,全部是方方正正的楷体,有些段落有另外一个笔迹的轻微修改。作者并没有落款,不过在今日看来,究竟是谁写的似乎也并不重要,那一个群体,谁的青春不是一样呢?

“内蒙古知青花名册”,多少故事在背后

“南京插队内蒙古知青花名册”早已被制作成一个单独的卷宗,登记时间是1970年12月。吴小玲,19岁;张军,23岁;田启涛,22岁;赵和林,23岁;朱元智,22岁;冯冰,21岁……他们的身份、文化程度、毕业学校、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每一个空格都填满了。

不难看出,这些花名册并非一次完成的,有不同人的笔迹、不同颜色的墨水,还有间或出现的涂改。或许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已经留在了这本卷宗里,且很快就将满40年!

他们或许同样不知道,当时为了他们,内蒙古专程来人,从5月26日到6月2日,赶了七八天的路来到南京,进行南京知识青年的“政审”工作。在内蒙古鄂托克旗插队的南京知青共874人,原来分布于南京60个中学。远道而来的内蒙古客人任务是知青们进行政审,而朝夕相处却使得他们与南京人的友谊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工作合作”。临别之时,他们洋洋洒洒写下了一份3页纸的“感谢信”:

巍巍钟山致谢意,滔滔江水寄深情,回顾这四个多月的共同战斗,我们深深体会到,时间虽短情不短,事情平凡思想高,你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小学生。
快报记者 郑春平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唱,一湾碧水映晚霞。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洒……

40年前,1087名南京学生背上行囊,告别父母和家乡,他们跨越千里来到遥远的北方、美丽的草原,鄂尔多斯鄂托克旗、乌审旗、鄂托克前旗到处都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足迹和歌声。

一晃40年,当年的青春少年已经两鬓斑白,可是总有一样东西让他们念念不忘,总有一个声音在梦里轻声呼唤。

当年的500多名知青,自发组织,踏上了千里“省亲”之路。从南京到包头,从包头到鄂尔多斯各个旗,他们终于重回几十年魂牵梦萦的草原之家。

有重逢的欢笑,也有相拥的哭泣。一次跨越40年的对话,为那些遥远的记忆,为那丝心底的牵挂……

人物 1

“当年我接生的孩子来接我了!”

知青:汪家旭
插队地点:鄂托克旗青招公社

1968年10月21日,这是汪家旭记忆中抹不去的一天。“那是我第一天到公社的日子,记得那天天特别蓝,从没见过那么清澈的蓝天白云,我们走下车子,迎接我们的是穿着节日服装的牧民们,个个胸前都挂了毛主席像章,他们骑在马上,朝我们笑着,欢呼着,喊着‘毛主席万寿无疆!’那个场景几十年来一直在我脑子里浮现,而且越来越清晰,怎么也抹不去!”

2008年9月16日,汪家旭省亲的那一天,似乎又回到了40年前:“天还是那样蓝,面前还是那么欢迎我们的牧民,依旧穿着他们在节日里才穿的民族服装,依旧冲着我们欢呼着、笑着……”就在那一刹那,汪家旭发现:原来自己的心早已留在了这片草原上!

就在汪家旭还沉浸在回忆中时,带队欢迎的当地一位领导走上前,微笑着对她说,“您是汪医生吧,还记得吗?我是您手接生的小腾啊!”阿腾,那个在蒙古包里接生的孩子?戏刷般的重逢,让汪家旭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掉!思绪一下子被带回了40年前……

当年,怀着“知识青年到越艰苦的地方去越光荣”的理想,正值青春年华的汪家旭离开南京的家人,来到鄂尔多斯青招公社红旗大队,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当年的赤脚医生如同全科医生,挨家挨户串门,牧民有什么病都要瞧,包括为牧民们接生孩子。可当时汪家旭自己是个大姑娘,对生孩子可是一窍不通。汪家旭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为牧民接生的情景,“当时自己很紧张,因为以前没学过,也没看过人家生孩子,啥都不懂,但当时情况紧急,人家都相信你这位赤脚医生,没办法,我拿了本书,现学现用,一边看书一边操作,硬着头皮帮人接生,孩子生下来我也瘫倒了!”

内蒙古有个传统,凡是替孩子接生的人,父母就把她视为孩子的“干妈”,因

她和母亲一起把孩子带来人世。在鄂尔多斯,汪家旭有20多个“干儿子”“干女儿”,汪家旭至今还能喊出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如今他们也都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子女,可照样没有忘记把他们带到人世间的“干妈”。得知自己的“干妈”从南京来了,他们有的从老远的地方骑着马赶来,特意送给“干妈”一件漂亮的蒙古袍子;有的专门替“干妈”篆刻了一枚章,上面还特意用汉文和蒙文刻上汪家旭的名字;当年第一次接生的孩子如今去了国外,可他的父母依旧惦记着孩子的“干妈”,特意来谢谢当年那位年轻的小医生……

也许是当年为牧民接生的经历,汪家旭后来成了一名妇产科医生,在她手里接生的孩子已经不计其数了,很少有人还记得“汪医生”,可草原上的这些“干儿子”“干女儿”却一直牵挂着她。汪家旭说,“他们也都是自己的孩子,无论在哪儿亲人都不会相忘的!”

事隔40年了,当年的牧民朋友还能记得南京的这些“老乡”吗?省亲那团光还有些紧张,可到了那里,到处都有亲人们体贴的温度。“每到一处,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牧民们都会热情款待,歌舞相伴,每天不到半夜不让我们回去!”

李鹤巨老人是孙国光当年在苏米图公社插队时的老朋友,如今已经77岁的老人听说南京的老友来了,专程从几十里外赶来。“一见到他,他就紧紧抱着,像久别的人那样,吻了我的左脸,又吻我的右脸,大家互相对望着,早已泪流满面……”

离开草原20年,这是孙国光和爱人李玉春第一次踏上返乡的小屋,当年徜徉在草原上的青春、爱情历历在目……

40年前,正值青春少年的孙国光满腔热情来到鄂尔多斯,分到苏米图公社的苏米图。在生产队劳动的3年半,他除了尽情领略草原的大好风光,还幸运地认识了自己的另一半,同样是南京去的知青——李玉春。

“当年我们俩分别是两个公社民兵连的连长,有一次旗里搞民兵训练,各个公社的民兵连都聚集在一起,训练期间大家也要搞联欢,我就偷偷看上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回想当年,孙国光的语气中还透露着甜蜜,“不过当时谈恋爱也不容易,那时两个公社离很远,有几百里路呢!我们俩人要见面都不容易,有时一个月都见不上面,不过那时候大家都互相勉励要以革命事业为重!”

尽管那个年代的物质很贫乏,可对于孙国光和李玉春来说,在大草原上的恋爱有着都市里没有的浪漫和激情,既可以在蓝天白云下策马扬鞭肆意驰骋,也可以在夕阳的余晖中依偎在马背上喃喃细语……爱

情的种子在草原上生根发芽,1975年,孙国光和李玉春结婚了!说起当年的婚事,孙国光连连感叹“太简单了”,“当时我们连个喜字都没贴,更别说办酒席了。除了一张小炕席,结婚没有添置任何东西。唯一拥有的就是当地牧民的祝福!”

“草原是我们汲取养分的地方,这里有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杨玉民告诉记者,当年来到大草原的时候,大家却还是“孩子”,“草原教会了我们怎么做人,我们现在虽然都60岁了,但我们的心理年龄始终像早八九点钟的太阳,这种精神正是内蒙古人民的精神!”

到草原插队是最艰苦的日子,杨玉民如今却把它当作一笔宝贵的财富,“草原人民博大的胸襟、直爽、憨厚的性格,无处不影响着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内蒙古人热情善良,他们把别人的困难都当作自己的困难,杨玉民也一直秉承了这样的特质,即便是后来回南京,做了公司领导,他始终不忘记草原人的秉性。

两次重回鄂尔多斯,杨玉民感慨变化实在大啊!“过去住的蒙古包、柳色房,现在都变成了一排排新房子,过去的脚踪土路现在都变成了柏油路。以前牧民们一年到头不洗澡,女知青们自己还要从南京背个盆过去,现在牧民家里都有了卫生间,而且家家都用上了洗衣机,真是难以想象!不仅如此,现在的牧民不再以马为交通工具了,几乎家家都有了汽车,像这里,120户人家有100多户都有了汽车,有的家里还不只一辆!”

返乡的几天,每经过一处地方,孙国光和老伴脑海中就像放电影一样闪过几十年前的一幕幕场景,而他们最想回去故地重温的地方还是双胞胎儿子出生的那个小屋,可惜已经找不到了。当年由于医疗条件差,李玉春不舍分娩时没有去医院,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接生员到家,因为怀的是双胞胎,生的时候还挺危险的,好在最后化险为夷。孙国光忘不了两个儿子的第一声啼哭久久在小屋里回荡着,孙国光说:“儿子可是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呢!我从从小就教育他们不要忘了根!这次返乡寻根,本来两个儿子也很想来,可惜时间没赶上,下次一定要他们亲眼来看看自己的故乡!”

“重回内蒙古上,我发觉又找回了人生坐标!”

知青:杨玉民
插队地点:鄂托克旗苏米图公社

杨玉民是“南京知青重返鄂尔多斯”活动组委会秘书长,正是他和组委会其他4位



重回草原,南京知青受到当地牧民热情接待

成员接近1年的筹备,才促成了这次大规模“省亲”。“草原是我们汲取养分的地方,这里有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杨玉民告诉记者,当年来到大草原的时候,大家却还是“孩子”,“草原教会了我们怎么做人,我们现在虽然都60岁了,但我们的心理年龄始终像早八九点钟的太阳,这种精神正是内蒙古人民的精神!”

到草原插队是最艰苦的日子,杨玉民如今却把它当作一笔宝贵的财富,“草原人民博大的胸襟、直爽、憨厚的性格,无处不影响着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内蒙古人热情善良,他们把别人的困难都当作自己的困难,杨玉民也一直秉承了这样的特质,即便是后来回南京,做了公司领导,他始终不忘记草原人的秉性。

两次重回鄂尔多斯,杨玉民感慨变化实在大啊!“过去住的蒙古包、柳色房,现在都变成了一排排新房子,过去的脚踪土路现在都变成了柏油路。以前牧民们一年到头不洗澡,女知青们自己还要从南京背个盆过去,现在牧民家里都有了卫生间,而且家家都用上了洗衣机,真是难以想象!不仅如此,现在的牧民不再以马为交通工具了,几乎家家都有了汽车,像这里,120户人家有100多户都有了汽车,有的家里还不只一辆!”

返乡的几天,每经过一处地方,孙国光和老伴脑海中就像放电影一样闪过几十年前的一幕幕场景,而他们最想回去故地重温的地方还是双胞胎儿子出生的那个小屋,可惜已经找不到了。当年由于医疗条件差,李玉春不舍分娩时没有去医院,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接生员到家,因为怀的是双胞胎,生的时候还挺危险的,好在最后化险为夷。孙国光忘不了两个儿子的第一声啼哭久久在小屋里回荡着,孙国光说:“儿子可是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呢!我从从小就教育他们不要忘了根!这次返乡寻根,本来两个儿子也很想来,可惜时间没赶上,下次一定要他们亲眼来看看自己的故乡!”

“重回内蒙古上,我发觉又找回了人生坐标!”

知青:赵晓文
插队地点:鄂托克前旗毛盖图公社明盖大队

赵晓文是“南京知青重返鄂尔多斯”活动组委会秘书长,正是他和组委会其他4位

成员接近1年的筹备,才促成了这次大规模“省亲”。“草原是我们汲取养分的地方,这里有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杨玉民告诉记者,当年来到大草原的时候,大家却还是“孩子”,“草原教会了我们怎么做人,我们现在虽然都60岁了,但我们的心理年龄始终像早八九点钟的太阳,这种精神正是内蒙古人民的精神!”

到草原插队是最艰苦的日子,杨玉民如今却把它当作一笔宝贵的财富,“草原人民博大的胸襟、直爽、憨厚的性格,无处不影响着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内蒙古人热情善良,他们把别人的困难都当作自己的困难,杨玉民也一直秉承了这样的特质,即便是后来回南京,做了公司领导,他始终不忘记草原人的秉性。

两次重回鄂尔多斯,杨玉民感慨变化实在大啊!“过去住的蒙古包、柳色房,现在都变成了一排排新房子,过去的脚踪土路现在都变成了柏油路。以前牧民们一年到头不洗澡,女知青们自己还要从南京背个盆过去,现在牧民家里都有了卫生间,而且家家都用上了洗衣机,真是难以想象!不仅如此,现在的牧民不再以马为交通工具了,几乎家家都有了汽车,像这里,120户人家有100多户都有了汽车,有的家里还不只一辆!”

返乡的几天,每经过一处地方,孙国光和老伴脑海中就像放电影一样闪过几十年前的一幕幕场景,而他们最想回去故地重温的地方还是双胞胎儿子出生的那个小屋,可惜已经找不到了。当年由于医疗条件差,李玉春不舍分娩时没有去医院,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接生员到家,因为怀的是双胞胎,生的时候还挺危险的,好在最后化险为夷。孙国光忘不了两个儿子的第一声啼哭久久在小屋里回荡着,孙国光说:“儿子可是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呢!我从从小就教育他们不要忘了根!这次返乡寻根,本来两个儿子也很想来,可惜时间没赶上,下次一定要他们亲眼来看看自己的故乡!”

“重回内蒙古上,我发觉又找回了人生坐标!”

文有着双重身份,他既是当年的知青之一,同时要作作为一名记者,记录这次的省亲之旅,记者的身份需要他客观地记录这一切,但知青的身份让他“冷静”不了,与相识的牧民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声畅谈……离开35年后,曾经在梦里出现的场景如今成真,点点滴滴都让他激动得浑身颤抖。在深深呼吸草原的空气时,他与自己约定:我还会回来!

一到曾经呆过两年时间的明盖大队,赵晓文就被牧民认出来了,“不就是赵晓文嘛,你胖了,你胖了!”在一个牧民家里,四五十个老乡挤进来看这返乡的知青,掀开门帘就叫知青都惊讶牧民们的记忆力是这么好,更令人佩服的是,他们对当年的一些小事也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你到我家去过羊”、“你和另一个知青到我队打井”……不过知青们却是叫不出老乡的名字,他们也不介意,自报家门,赵晓文拿出一张大纸,把这些名字一个不写下来,一张纸都写不下。

让赵晓文尤其感动的是,他们这次省亲计划是安排18日到牧民家中,但16日他们刚到各个旗里时,已经有牧民赶过来,等在宾馆提前来“认亲”了,“那个镜头太感人了,老乡看到知青,冲上来叫出他的名字,知青都很诧异,有一个老乡,汉语讲得不太好,也等在那里,我问他找谁,他说了个名字,可惜我不认识。”赵晓文说,那个老乡就像一个痴情汉在等自己的情人,满心的盼望写在脸上。“由此可见,这么多年了,南京知青思念大草原和牧民,但牧民更加想念南京的男娃女娃。”

当年包括赵晓文在明盖大队插队的知青有12个人,这次回去了8个,大队书记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大队最热闹!”可是分别的时候,也最伤心,“牧民知青都哭,牧民叫我们常常哭,抓着手久久不肯放……”依依不舍分别后,赵晓文和其他知青回到了旗里,而当晚,他离开其他人单独行动,他要找一个人。

这个人叫苏秀英,是个汉族人,是个牧民的婆姨(妻子),赵晓文刚插队时曾在她家住过,只比他大三四岁,当年这个身材婀娜、说话温柔又心灵手巧的贤惠女人,让18岁的知青赵晓文心生朦胧的爱慕之意,只不过五六天后他就离开了这个牧业家,搬到别处去住,“有的人想要记住,就不会忘记。”在与老乡聊天中,他听说苏秀英已与老蒙队明盖大队,有个人正好认识她的居处,9月18日晚上10点,赵晓文便央这个老乡带他去找苏秀英,“不去就没有机会了!”可是赶到那里,发现大门紧闭,“难道就这样没有缘分吗?”正在他失望时,来了一个小姑娘,一问,苏秀英是她的姑奶奶,她把赵晓文领到另一个地方,苏秀英出来看到赵晓文,惊讶得张大嘴,两人叙叙旧,赵晓文便告辞了,“当年她不知道我的感情,现在对我来说,她也就像其他老乡一样,都是亲人。”

想见的人都见到了,不过赵晓文说,他还欠一份“情债”,赵晓文在明盖大队插队两年后,又转到了另一个查布公社阿何布拉格大队,但这次因为时间关系,他没时间去看看,“下次再来吧!”他跟自己约定说。事实上,很多南京知青都有返乡情结,回去三四次,甚至每年都抽时间去看看,住半个月,一个月的大有人在,“我们最好的青春岁月在这里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回忆也都留在这里,谁也不想回来!”

快报记者 郁怡文 陈英 A4、A5 版照片由杨玉民、朱敬馨、姚长征提供

你们的人数已无法统计,你们的故事却被铭记

南京知青,四十年青春记忆



当年南京赴内蒙古省亲的合影